

《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重要中译本50年书话

张 小 鼎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进步记者、作家斯诺报道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25000里》……等绚烂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译名,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延绵不断地被翻印出版,从而感染、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西行漫记》成书前的“传播”方式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个月之久的外国记者,终于秘密地满载而归,返回北平。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道,诋毁造谣说:“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当时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被害”的“讣告”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缄默不语,斯诺当机立断,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同时,斯诺还多次通过讲演报告会,放映有关红区影片和幻灯与图片展示会等,及时进行宣传,扩大他陕北之行的影响。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作了题名《红党与西北》的著名长篇报告,介绍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况,西安事变的背景和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陕北红区的见闻等等。这是斯诺回北平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公开演讲,听众达二百多人,反响强烈,影响很大,甚至连英国使馆保守的外交官员阿斯普兰德博士听后也声言,如果红党真像斯诺介绍的那样,那么他们也会同意,红党的部队“任何时候都可进军北平。”^①同年2月5日及22日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临湖轩举行的首次放映苏区新片会与访陕见闻报告及影片、幻灯放映会,也非常成功,到会人数前后达五百多人,连上海慰劳抗日军队代表团的著名演员陈波儿等亦前来参加。据有关同志回忆,1937年春的一天,斯诺还在燕京大学心理系美籍教授夏仁德的客厅里向二十多个进步学生介绍陕北红区见闻,并在夫人海伦协助配合下放映他所拍摄的小电影。他一面播放映机,一面口头用英语解说,不时还夹杂着一些生动风趣的汉语,当影片最后出现周恩来和一位满脸胡须的人握手时,还幽默地用汉语介绍说:“你们知道这个大胡子是谁吗?是个‘帝国主义’者。”^②原来这几个镜头是斯诺请别人代他拍摄的;由于采访工作繁忙,多日没有刮脸而变成“大胡子”的“帝国主义”者正是他自己。当大家仔细看清后,立即爆发出哄堂大笑并报以热烈掌声。斯诺正是通过报告、影片与幻灯、图片等使“红旗下的中国”给广大学生和许多教授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所做的这一系列演讲、报告及展出的照片,有许多就是后来《西行漫记》一书的素材、内容与插图。为了彻底戳穿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无耻谎言,尽快将红区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英雄红军长征的动人事迹迅速公布于世,斯诺在助手的密切配合下,紧张勤奋地向上海《密勒氏评论

报》、《大美晚报》、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积极投稿，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情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也就是说，《西行漫记》中的不少篇章最初是在中国国内英文报刊上公开登载的，这很快轰动了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致使南京政府当局惊恐不安。当《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稿写出后，斯诺还将几本英文打字原稿，请进步同学传看，并出示了一件“宝物”——中文抄写的毛主席咏长征诗七律一首。大家逐一细看，爱不释手；龚澎还借去“红星”的原稿选译了几章，在燕京大学的群众组织“民先”——即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中传阅。受斯诺的启发和鼓舞，一些同学还自动组织起来，以利用春假到西安旅行为名，打着“燕京大学西北旅行团”的旗号，按着斯诺所划路线草图，离开北平，几经风险，终于抵达陕北，并在延安窑洞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尽管如此，由于“红星”全书尚未问世，更未译成中文出版，其作用和影响无论从地域、空间或读者对象来说均难免不受影响。

《西行漫记》的雏形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在斯诺为中国的英文报刊撰稿的同时，还接连向英美报纸《每日先驱报》、《信使晚邮报》和《太阳报》等发出许多有关红区的电讯报道。他和夫人海伦·斯诺将报道原文及有关照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王福时。1937年春，由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李华春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地出版了，其时约在3月下旬或4月初。当时正处于“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暗探和日本特务活动频繁；外交月报社的李放等译者往往要在更深夜半悄悄赶译，然后通过出版主持人和总编译王福时的关系送往位于今府右街中南海西门里的《东方快报》印刷所排版。原来该报系“九·一八”后在张学良倡议下，由东北人士于1932年12月25日在北平创办的，其宗旨是：“团结东北军民，抗日救国，恢复失地”；所以对接受这样一部宣传革命真理，政治色彩鲜明的书籍，排字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此书从翻译到出版，不到两月，即全部完成。书籍封面则采用“统一战线舞”照片，即陕北红区八个少女英姿飒爽、动作协调的舞蹈场面，其主旨含义正如斯诺在扉页解说词中所明确指出的：“是动员全中国人民来抗日”。这样的封面构图设计，既“冲淡书的政治外表，保护读者”，又仍然“能引人注目，故意使书象文艺小说似的。”^③至于题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由此也可看出编译者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恶劣环境中，斗争艺术与策略巧妙。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系32开本，近300页。书前有译者重要序言，概略地介绍了此书材料来源，作者情况，以及编译此书的用意与期望。序言还着重指出中国当时政治局势已发生的重大变化，高度评价了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去年双十二西安政变，民众多年来盼望的国内和平统一，赖蒋委员长及西安陕北方面之顾全大局，互相让步，得以实现。这在中国近代史中，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为适应环境，避免查禁破坏，正如封面有意未标明出版机构名称，序言的写作地点则将北平署作上海。全书约三十万言，现将其主要内容、特点概述如下：

一、全文发表《毛（泽东）施（乐）会见记》和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的长篇重要报告《红党与西北》，斯诺撰写的以《红旗下的中国》为总标题的一组报道共十三篇，以及重要文章《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

同时收有诺尔曼·韩蕲尔报道四川红四方面军及苏区情况的《中国红军》等三篇文章。构成此书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一章里所收十三篇文章和《毛施会见记》中《论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字，后来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至于书名使用“外国记者”字样，而未单署“斯诺”，自然也与收入韩蕲尔的三篇文章有关。

二、此书以“附录”形式，收入陈云1935年秋化名廉臣所写长达50页的重要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该文原载1936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莫斯科曾出版单行本。由于作者在文内假托自己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月，途经六省的种种见闻经历，较系统地记述了有关长征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文笔之绘声绘色，十分感人，颇能吸引读者。它与书末首次刊排的毛泽东咏红军长征诗（七律）一首不仅弥补了斯诺当时还未完稿而此书没收的“长征”一章四节之缺憾，而且也确实为“西北印象记”一书增辉不少。

三、此书收入斯诺夫妇提供的有关陕北苏区34幅照片，并配以生动的说明文字，那张曾经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收入其中。同时刊出了穿插全书字里行间的著名的《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歌》等十首歌曲，封底还印有斯诺从苏区带回的红军长征路线详图，使全书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人民和红军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增强了读者的阅览兴味，有效地扩大了政治影响和宣传作用。

由于此书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数月即先行出版，最先客观翔实地介绍了陕北红区和共产党的真像，及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因此尽管是秘密销售，且大部分是通过东北大学“民先”组织和个人义务推销，但初版五千册却顷刻售完，它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各地。不久上海和陕西又分别出版了以“丁丑编译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国各地为突破敌人查禁封锁而采取改换书名，故意不标明出版地点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节印本如《红旗下的中国》等则更是不计其数。该书译者之一的李放著文说，他38年夏南下中，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印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一个小书摊上都能见到有此书在出售，其传播速度之快，翻印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1937年5月，书出后不久，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去延安，曾将北平版“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主席，所以，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一仍其旧地引用该书所载两年前海伦对此书的及时出版与历史作用极为重视。在《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1962年出版）的序言里，斯诺曾说：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问世之前，“就有一个中文本出来，它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在这些读者中有不少青年人在我最近再度会面时已成为今日红色中国的二三层领袖人物”。前夫人海伦在致友人信中说：“王福时和我对突击出版第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和一些访问记，是主要负责者”；^⑤她给王福时的信里对此则热情评价道：“你出版的斯诺一书对中国象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我们倾全力使它尽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译本突击出来。这是一宗真正的美中合作。”^⑥

关于此书的流传和影响还有两件值得提起的趣事。1949年6月，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新中国即将于隆隆的炮声中诞生的前夕，又同时出现了以“上海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的两种版本：一本题名《中国红区印象记》，作者署名美国记者；一本题名《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作者署名廉臣。即它将1937年原《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分为二，各自独立出版。前者封面右上方照片文字说明改为“全部美式配备之人民解放军”，看后令人精神为之振奋！仅仅十二年，红军与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奇迹般的变化，而细看该书内容却能发现有若干段落明显脱漏与字迹不清之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细阅该书扉

贡所登“征求战时版本书一册”之启事，方知由于敌人的入侵，所有存书全部焚毁，“纸型保存不易，被鼠咬坏”，故出现上述异常现象。为此，编辑部特别郑重声明：“寄到战时版本书之第一人，酬本书市价十倍之书籍或现金。其次寄到者，第二名至第十名，除原书奉还外，各赠鲁迅先生《集外集》一册。”至于后者廉臣的著作也并非此时才从全书中分离独立出版，实际早在1939年1月即曾将其抽出与斯诺有关描写长征的文章合为《长征两面写》一书，并列署名为“(美)斯诺、廉臣等著”，由大文出版社出版；倘继续追本溯源，则早在1938年1月，它就从“西北印象记”中独立出来，以《从东南到西北》为书名由明月出版社单独出版，而作者与国籍，索性公然标明：“(美)廉臣著”。管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这样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原书“西北印象记”正文主要是斯诺著作，同时兼收经济专家韩蔚尔氏的三篇文章，而他们都是美国人。至于附录则仅收廉臣此篇，由于其时人们大都不知它是陈云同志的化名作品，因之不辨国籍而误作“外国记者”均美国人。另外一种可能则明知此文出自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中国人之手，但为迷惑敌人，避免查禁，采用了改变书名和作者国籍的斗争韬略。随着岁月的流逝，沧海桑田之变化，建国后，不少读者对假托国民党军医身份，化名廉臣的作者究竟是谁，窥测纷纷，莫衷一是。直至近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出版了正式署名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①这一谜底才炯然公之于众。

“西北印象记”出在英文版“红星”之前，所以与其说它是中译《西行漫记》的节印本，毋宁说它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或许更为确切些。

“红星”的正式中译本——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

1937年11月国军彻退后，上海沦为“孤岛”，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一律被严加取缔。进步文化界在胡愈之的发动和倡议下，由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胡仲持、冯宾符、张宗麟等共同集资组织了“复社”。他们利用当时出版印刷业萧条，纸张价格低廉的情况，全力以赴，多方设法，冒着风险，翻译出版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而“复社”旗开得胜，鸣响第一炮，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的第一部书刊，则正是“红星”在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译本——《西行漫记》。

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是在胡愈之同志组织筹划和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于1938年2月10日于上海孤岛问世的。其出版经过，既曲折又神速，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据胡愈之回忆，当他从斯诺手里借到刚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戈兰茨公司10月所出“红星”英文版样书，阅读后，异常欣喜。为慎重起见，他曾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此书写作背景与有关情况。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便在抗日救亡人士所组织的定期集会——“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所谓“星二座谈会”，即一群爱国救亡人士每星期二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座谈讨论会如何进行抗日宣传问题。经协商讨论决定由参加座谈的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出版资金则通过每人捐款及利用社会关系征集读者预约金，并组织一些义务劳动等筹集起来。由于抗日情绪高涨，大家尽心协力，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出书，仅仅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其工作效率之高、出版速度之快，装帧设计之精，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初版精装本是大32开，暗红色漆皮面(第二版改为红布面精装)。扉页上以醒目的字体标

明：《西行漫记》，1938年，爱特伽·斯诺著，(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 复社藏版。

此书虽据伦敦“红星”初版译出，但复社出版时，斯诺对原著的文字又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作者还应约于1938年1月24日为中译本撰写了一篇情真意切，诚挚动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首。序文结尾，他着重指出，中译本是由复社发刊，他情愿把自己的许多材料和版权让给复社，希冀中译本像复社预期的那样，能有广大的销路，以对中国有所帮助，并深情地预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书前的《译者附记》中，除详尽介绍了作者斯诺的经历、著作与此书在西方的传播影响外，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指出“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二是称赞斯诺与其夫人韦尔斯女士（按：即海伦·福斯特·斯诺）是“真正的中国的朋友”。强调“假如没有热诚和丰富的同情，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报告文学”，结尾热情洋溢地写道：“在这伟大的艰苦的年头，没有比中美两大民主共和国的友谊，更值得重视，而埃德加·斯诺先生这一本巨著，却是用这伟大的友谊当作养料所栽植的鲜艳的花。我们从这里更加坚信全世界民主国联合战线的胜利前途了。”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7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进行过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余里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旅行游记，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信息以及我党在西北地区的实况，以后还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聪明的读者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十分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部与我们党的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

人们知道，伦敦“红星”初版本共十二章五十七节，由于复社版《西行漫记》未译第十一章中所写与共产国际有关的李德*那节文字，因而全书便成了十二章五十六节。书内除附有斯诺和海伦先后去陕北保安与延安等地采访时所摄珍贵照片外，还印有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两幅。

复社《西行漫记》的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的欢迎，初版顷刻售罄。它奇迹般地问世和迅速流传，使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惊恐万状，随即下令严加查禁。他们派人四出搜寻，逮捕了不少进步文化人，进行严刑拷打，妄图破获“复社”，终竟一无所获。而在短短的十个月中《西行漫记》却接连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重印翻印本则无法统计。在沦陷区和白色恐怖区，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或怀揣珍宝一样秘密携带《西行漫记》，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对此，斯诺本人也有深刻感受，他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香港和大后方。正如斯诺后来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所生动叙述的那样：“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那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长象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⑧接着他诙谐地写道：“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可惜我未受招募的委托……”^⑨他在《〈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版序》中也坦率自豪地说过：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国人，未译文字即第五节《那个外国智囊》。

“在数以万册计的中文译本中,有一部分完全是在游击区出版的。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⑩毛泽东同志对斯诺的这部书也给予很高评价,热情赞扬这部书是“外国人报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⑪据斯诺回忆,1939年当他重访陕北边区时,在延安曾多次会见毛主席。当谈及此书时,毛主席当面向他肯定说:“《西行漫记》正确地报道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他看过该书的全译本)。”^⑫斯诺又说:“在延安的一次党政军全体人员大会上,他还亲自不厌其烦地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干部们,说我是本‘忠实反映我们情况的书’的作者。”^⑬

由于《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乃至“油印的节本”迅速广泛的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惶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人们知道,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取缔办法”一般分为“暂停发行”、“停止发行”和“查禁”等几种处置手段;而对“复社”版《西行漫记》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严加“查禁”。推而广之,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红军四杰》、《长征两面写》、《西北散记》……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尽管如此,由于党的有关组织和进步文化人士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突破反动书报检查制度的封锁,使《西行漫记》等著作像春风中的芳草,到处滋生蔓延,传遍了神州大地。

含“第十三章”的两种《西行漫记》特殊译本

研究斯诺的学者都知道,美国版的“红星”是1938年1月3日由兰登(Random House)出版社发行问世的,它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Gollancz)公司发行的初版相比,除插图外,内容完全相同,都是十二章五十七节。1938年7月“红星”在美国再版时,鉴于中国战局的急剧变化,正在中国采访战事的斯诺,诚恳地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不但将原书十二章作了必要的修订,删去了第十一章中的一小节,而且还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共六小节。这章对共产党人的著名游击战术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评价,同时阐明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新发展,对中国抗战最终必然获胜作了乐观地展望。

1949年在蒋家王朝面临彻底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上海又出现了两种依照美国1938年7月版译出,含有第十三章内容的引人注目的新版本。

其一,《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史家康、赵一平、王念龙、顾水笔、祝凤池、张其韦等六人合译,小三十二开本,启明书局出版发行。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故现在特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书前冠有原兰登再版时的“引言”和中译者在1939年3月所写“小引”。《原书引言》有助于我们了解斯诺为何要增写第十三章的缘由、经过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也称赞了斯诺富有远见的预言,高度评价了“红星”,说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册永久文献。”中译者撰写的《小引》,详细介绍了斯诺的履历,强调了他是“一位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的名记者,他既没有国民党作为他的背景,也并无与共产党发生过什么关系。”因而“他的立场可算是公平的、客观的。”正因为如此“本书虽然不能算作正式的文献,至少也可当作一部良好的报告文学。”最后还着重指出“红星”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主要是由于斯诺文笔的“优美”和报道内容的“精

采”。他们翻译此书的意图是“希望中国英勇的革命情绪和热烈的抗战精神能像本书中活耀的革命故事和抗战史料一样普遍地流传到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译者论述较为公允，具有相当水平，他们继“复社”版后，依据兰登再版本译出此书，确实是为继续扩大“红星”在中国的影响，鼓动全国民众坚持抗战到底。事隔十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出的“新1版”仍然很受欢迎，顷刻销售一空，当月再版。在“新2版”中，增加了钱公侠所撰《〈长征25000里〉序》，他赞誉这部报告文学名著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同年11月，上海出了第三版，香港又印行了一版，其影响可见一斑。

其二，《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译者署名“亦愚”，1949年9月上海急流出版社印行，大32开，除扉页附红军长征路线图外，书中还印有照片14帧。书前冠有译者所撰重要“小引”，由于是现时所写，针对性很强，从下面引文可看出译者目的在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在一个中立人士口中的记述，决不会偏护于任何一方的。烂铁与真钢在熔炉中的温度之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又说：“一本惊动世界的文献，似乎需要更多的译本，以广流传而遍及各地，把共产党的精神，灌溉到全中国人民的心田之中，以达改变陈旧的封建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或者是不无借镜的。”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对斯诺原著进行了一些“增删”，原因据说是斯诺对于一、二个红军领袖的传记，全凭传闻直录，所以“略有错误，有改正的必要。译者为郑重起见，略有增删，以符事实。”此书还以同一译者名与书名，在北京用新潮社名义于1949年出版一次。

香港所出《西行漫记》版本拾零

从一些文献资料记载和许多文化人的回忆文章看，五十年来香港出版流传过不少有关《西行漫记》的全译本、节印本和翻版本。囿于个人见闻，仅就亲眼看到的介绍点滴也算聊胜于无。

除了上节文字提到的史家康等译《长征25000里》，曾以香港启明书局名义印行外，还有下列两种版本值得一谈。

一、《西行漫记》，署名林淡秋等十二人及“广角镜出版社”编辑部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5年12月初版。大32开本，封面以黄镇同志长征途中所绘泸定桥为衬图，配以红色的《西行漫记》书名，别具特色，庄重典雅。书前印有“中共红军长征示意图”，书内还有珍贵摄影数十幅。此书实际是以“复社”1938年版为底本，添加部分文字和图画后翻印，这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有交待。其特点如下：

（1）在全书正文前加印了黄镇的《长征画集》，共图24幅，配以生动的说明文字，该“画集”据六十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画集》影印。

（2）正文后增加了八则附录文字，是此书的另一特点。八则附录分别为：附一，增订注释；附二，再访毛泽泽；附三，周恩来生平；附四，关于统一战线；附五，共产主义小组；附六，外国智囊；附七，人物小志；附八，中英文姓名对照表。附录前还收入斯诺1944年所写《后记》一篇。八则附录中的前七则系由广角镜出版社编辑部译自经斯诺生前修订的“1973年印行的英文修订本”。但对“附录内所涉及的有关人物的姓名、事迹、职位，本社亦作了力所能及的订正，并作了微小的删节。”附录八中的“中英文人物姓名对照表”，目录包括孙逸仙、宋庆龄、瞿秋白、杨虎城、李宗仁、汪精卫……等不同政治面貌的各种人物达百余名之多；此系该社编辑部所加，以便于核对。不难看出，这样附录内容丰富的版本，无论

在香港或内地，似乎都是难得的。这部《西行漫记》也很受欢迎，从1975年12月初版到1977年的4月，仅一年多时间就印行了四版。第二、三版无缘见到；就第四版而言，知其已删附录七和八。

二、《西行漫记》，陈云翻译，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分上、下两册于1975年11月和1977年1月先后出版；1977年5月出合订本初版。合订本系大三十二开，454页，有插图31帧。此书也是据1973年英文“最新修订本”译出。扉页刊有纽约，格罗夫出版公司关于“本书新版本内容介绍”，颇引人注目。全书除正文外，还有以下几项重要内容：

- ①美国费正清博士1961年所作《导言》；
- ②斯诺1944年5月所写《1944年版作者序》；
- ③斯诺1968年2月所写《1968年版序》；
- ④斯诺所编写的《中国革命年表》；

前三篇冠于正文前，末篇附于全文后。这些对我们了解、研究《西行漫记》的世界影响，历史地位以及斯诺的思想经历、写作意图，修订经过……等均属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样一部很有特色的新译本，自然同样也受到读者欢迎，上册问世后，翌年8月便再版，待到1977年8月已第三次印刷。然而此书不能不视作重要缺陷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原著的某些重要章节竟被随意删节或部分还原。

《西行漫记》节译本、抽印本情况综述

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重要版本一起广为流传的许多摘译本、节印本和抽印本则根本无法统计。它们像无数神奇的轻骑兵，忽隐忽现地出没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这些版本名目繁多，却极富艺术魅力，如：《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等等。这些异彩纷呈的书名，按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毛泽东生平、自传；二、红军长征和红军将领的传奇式经历；三、陕北苏区新社会综述报道。^{*}它们的材料来源，有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西行漫记》中抽出专章或有关内容重新选编辑为新书；有直接译自英美报刊的，如汪衡《二万五千里长征》，翰青、黄峰合译的《毛泽东自传》均系译自《亚细亚》（《Asia》，美国纽约出版）月刊。

值得提到的是各抗日根据地和各个解放区印行的版本，它们深深地刻下革命战争艰苦年代的印痕；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广泛流传。其中不少版本还保存有各种内容、名称的印章，如：“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处图书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处图书馆”；有的还保留着日本伪满时查封的印戳，如：“满铁调查部资料，昭和15.9.3”、“秘”等……凡此种种带有历史印迹的作为文献本收藏于图书馆、博物馆颇富教育意义。

这些书籍有不少以斯诺署名，但书中收有大量中外人士撰写的重要文章或珍贵文献史料。例如，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店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除正文外，还收有四篇文章。其中有史沫特莱1937年3月在延安拜会毛泽东后采写的重要报道《毛泽东论抗战必胜》，以及芦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位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明我党合作诚意，敦促其“领导”抗战的题为《毛泽东等呈蒋委员长一致对日抗战电文》

^{*} 以《毛施会记》、《毛泽东印象记》等为书名的小册子也相当流行，但除极少数收入“红星”的雏形本外，均未见于《西行漫记》，故当属另一类别，此处不赘。

等重要文献。又如：汪衡译《毛泽东自传》，1937年11月文摘社版，正文之外还刊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以及主席、斯诺等罕见之照片。再如吉林书店1948年版《毛泽东》，全书120页，内中收汪衡译《毛泽东自传》只37页，而其他篇幅则收录了中外作家如孔厥、草明、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等人描写报道毛泽东的文章。同时，还以《重庆之行》为题，采集一组报道毛泽东1945年亲赴重庆谈判的纪实性文章，这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史料。

具有“文献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两种新版本

“文革”期间，万马齐喑，百花凋谢。在震耳欲聋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声浪中，像当时许多被“打倒”的党政领导、将军元帅惨遭迫害一样，《西行漫记》也被禁锢在许多文化机关和单位，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密封于图书馆停止出借。至于“红卫兵”采摘其中的个别章节公开地大量散发或出售，当另作别论。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

一、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书“红星”的第四、五两章，这是构成《西行漫记》的主干，也是这一名著的骨骼和灵魂；此外还收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三篇重要谈话。书前冠有吴黎平1979年8月所写《前言》（全文另发），它为我们了解定稿整理者对《西行漫记》的评价，建议出版这个本子的意图以及校订经过等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人们知道，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10月在保安窑洞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往往从晚九点谈至翌日凌晨两点，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正是吴黎平同志。所以，作为当事人之一，他依据“红星”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记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作了必要的订正。诚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中“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原来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④吴黎平同志为此书所加的一些脚注订正了个别史实，丰富了原书的背景材料，加深了对原书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它具有重要的文献性价值。

二、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诺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实际需要，曾对《西行漫记》一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1938年7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国过去流行的众多版本没有一个真正是如实按初版本译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个正式译本“复社”版，虽也依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时，一是经斯诺作了修正，有许多和初版不尽相同，二是未译涉及共产国际的李德那一节。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的第五节，使全书还原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这无论对我们研究斯诺的原著、修订情况或他的思想演变都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之举。该译本《出版说

明》声称：“全书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而译文又出自名家高手，因此，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四十多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的全译本，基于以上种种缘由，无疑它有条件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版本。书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写《中文重译本序》（全文另发）及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写“序言”（全文另发）这是两篇读来亲切感人的重要文章。该书扉页有据复社版翻印的长征路线图，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著名诗句；全书另收照片69帧。开本分大、小32开两种，初版三十万册，很快售罄。1980年2月加印，两年间就发行165万册。这一全新译本，同时又收入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诺文集》第二卷，扉页恢复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将《西行漫记》改为副题。其发行量在单行本畅销全国后，仍能一次征订印行28,500册，这些数字雄辩地证明：《西行漫记》具有何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1988年6月为中美联合举办的“纪念《西行漫记》

发表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作。

[附注]：

- ① 海伦·福斯特·斯诺1937.1.26.致兰德尔信。
- ② 赵荣声：《步着斯诺的后尘到延安去》。
- ③ 李放：《斯诺〔西北印象记〕翻译始末》。
-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1966.7.横排本）第二卷p.414。
- ⑤ 转引自王福时：《抗日战争前夕斯诺帮助出版的一本书》。
- ⑥ 王福时：《抗日战争前夕斯诺帮助出版的一本书》。
- ⑦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⑧ 引自《斯诺文集》第三卷p.213；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 ⑨ 引自《斯诺文集》第三卷p.214；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 ⑩ 译文引自陈云翻译《西行漫记》（上），香港南粤出版社1975年11月初版。
- ⑪ 转引自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1.29）。
- ⑫ 引自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8月版。
- ⑬ 引自斯诺：《红色中国杂记》p.88。
- ⑭ 引自《〔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p.7。

中译《西行漫记》版本目录*

(包含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

-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王福时等译 北平 1937年
- 《西北印象记》 上海丁丑编译社 1937年
- 《西北印象记》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37年11月
- 《中国红区印象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9年6月
- 《红旗下的中国》 赵文华编译 上海大众出版社 1937.12.
- 《西行漫记》 林淡秋、王厂青等12人译 上海“复社”1938年2月10日初版 4月10日再版、10月10日三版、11月10日四版 上海“复社”1939年 大连“复社”1948年9月二版
- 《西行漫记》 林淡秋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60年2月
- 《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 史家康、赵一平、王念龙、顾水笔、祝凤池、张其韦合译 上海启明书局1949年6月新1版, 1949年6月新2版, 1949年11月滬8版 1949年新4版, 1949年香港第1版
- 《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 亦愚译 上海急流出版社1949年9月版, 北京新潮社 1949年版
- 《西行漫记》 内文译者: 林淡秋、王厂青等12人 附录译者: 本社编辑部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75年12月初版; 1976年1月版; 1977年4月4版
- 《西行漫记》 陈云翻译 香港南粤出版社。(上册) 1975年11月初版; 1976年8月再版; 1977年8月第三次印刷; (下册) 1977年1月初版; (合订本) 1977年5月初版 1978年7月第二次印刷
-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 吴黎平译 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二次印刷。
-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2次印刷
- 《红星照耀中国》(收《斯诺文集》第二卷) 董乐山译 新华出版社 1984年8月第1版
-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上海文摘社 1937年11月初版
-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上海文摘社 1937年11月再版
-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华北新华书店
-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6月再版
- 《毛泽东生平》 斯诺等著 汪衡译 太岳新华书店编印 1947年3月
- 《毛泽东生平》汪衡译 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7月再版
- 《毛泽东传》 汪衡译 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年12月
- 《毛泽东传》 汪衡译 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
- 《中国共产党年表(附: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冀中新华书店
- 《中国共产党年表(附: 毛泽东自传)》 胶东新华书店 1947年11月
- 《中国共产党年表(附: 毛泽东自传)》 大连大众书店 1948年8月
- 《毛泽东自传(附: 中国共产党年表)》 吴平译 北京民主书局
- 《毛泽东自传——附毛泽东论抗日战争》 汪衡译 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
- 《毛泽东传》 汪衡译 辽东书店 1948年初版
- 《毛泽东》斯诺等著 吉林书店 1948年
- 《毛泽东自传(附: 中国共产党年表)》 方霖译 新民主出版社 1947年 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5月香港再版 新民主出版社(港) 1949年
- 《毛泽东自传》 翰青、黄峰合译 上海光明书局 1937.11.3.初版 上海新生图书公司 1938年1月(三版)
- 《毛泽东自传》 李杜译 汉口抗敌出版社
- 《毛泽东自传》 毕正译 新建出版社
- 《毛泽东自传》 张洛甫译 陕西延安书店 1937年
- 《毛泽东自传》 平凡译 战时文化书局 1937年
- 《毛泽东自传》 张宗汉译 延安文明书店

古籍中的增修本和著录审校

崔建英

古籍中，同一版图书已经流通，又增益篇卷的，称增修本。

增修本多见于族谱、传记，地方志、山志、寺庙志、祠堂志等递增性史料文献，但明清间一些诗文集也屡有所见。

如：增定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明孙一元撰 附录一卷 明万历二十五年张睿卿刻，万历三十九年增修本增补遗一卷。有万历辛亥（三十九年）张睿卿补遗叙，称：“余既刻《太白山人漫稿》成，词林竞赏。嗣后往往从故家得山人手迹……凡得若干篇……因分次合而梓之。”

虽也是利用同一种版片增加篇卷，但重新做了全面调整，编排体系不同，则属异版别本。

如：甲，秋笈集二卷附西曹杂诗一卷 清吴兆骞撰 清康熙徐乾学刻本。吴兆骞赋并志曰，“余弟汉槎自塞外贻书徐健菴，以所著《秋笈集》奉寄。今健菴亟谋剞劂，不负故交万里之托。余为怆然感泣，赋此志谢”。《秋笈集》不标卷次，前一卷赋、后一卷诗。

乙，秋笈集八卷 清吴兆骞撰 清雍正四年吴振臣刻本。雍正丙午吴振臣跋曰，“右《秋笈集》八卷，先君子汉槎先生所作也。先君少负大名，登顺治丁酉贤书，为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宁古。……昆山徐健菴先生悲故人之沦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问世。……振臣愚

1937.10（再版）

《毛泽东自传》 丁洛译 上海三友图书公司

1946年2月

《毛泽东自传》 国际出版社1946年版

《毛泽东自传》 新广东出版社

《毛泽东自传》 上海文字出版社1949年5月

《毛泽东革命史》 上海自强出版社

《毛泽东自传及其他》 林明编 智慧出版社

1949年5月

《人民领袖毛泽东奋斗史》 王岱译 大众读物出版社 1949年6月

《二万五千里长征》 汪衡译 文摘社 1938

年1月1日初版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 天明译 上海文学出版社 1949年5月

《长征两面写》 史诺 廉臣等著 大文出版社 1939年1月

《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即《红军四杰》

郭文彬译 一心书店出版

《“红军四讲”》 佚名译 新生出版社

《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 史诺著 陈仁编译

自强书店出版

《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进》 新生出版社 1938年

《西北散记》 邱瑾译 汉口战时读物编辑社

1938年2月

《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 施洛著 上海明明书局出版

《中国的新西北》 思三译 平凡书店 1937年5月

《西北新社会》 史诺等著 战时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红区》 史诺等著 上海救亡出版社

1938.1.1初版

* 这个简表编排请参考正文中“情况综述”一节，它显然很不完全，有待今后进一步发现、充实。